



桂诗春英语教育未了集

桂诗春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GUI SHICHUN YINGYU JIAOYU WEILIAOJI

桂诗春英语教育未了集

桂诗春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诗春英语教育未了集/桂诗春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

ISBN 978-7-04-036284-8

I. ①桂… II. ①桂… III. ①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①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129 号

策划编辑 艾 斌
责任校对 韦 玮

责任编辑 韦 玮
责任印制 张福涛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8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6284-00

前言

我治学不深，既无家学渊源，初中和小学阶段又适逢乱世；侥幸进了大学，虽有名师指导，但因政治运动不断，亦未能潜心读书。自幼喜欢看书，而家无藏书，只得到旧书摊上淘书，不管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囫圇吞枣、食而不化。好在读书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偶有所得便想把它写下来。

我的写作生涯大概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7到1951年间曾在香港《新生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章发表过100多篇杂文（译文）。这是我从思想朦胧逐步走向进步的阶段。在我思想发生变化以后，我决心和过去决裂，把我在《新生晚报》上发表的东西“付之一炬”。最近在网上见有一个《香港文学资料库》（设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上去一查，居然找到我在该报上发表的东西，共有84篇。我也无意于找回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已经到了它们应该去的地方。至于其他的一点我认为是“进步的”东西，现在看来也觉得无甚价值。曾经有一位研究者希望我能提供给他以便探讨我的学习生涯的轨迹，我也婉言拒绝，因为它们无非是一个初学者的习作，献丑不如藏拙。第二阶段是1952年到1973年之间，这个阶段我主要从事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也编写过《外国文学》的讲稿（约10万字），写过两篇论文，参与过英国文学史的部分翻译和《英语语法入门》、《英语动词》的部分写作和编辑工作，也写过一篇关于词类的论文，在系学术会议上宣读；业余也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的副刊和文艺副刊发表过一些杂文和文艺评论，这个阶段所写的东西该发表的都发表了，可说是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必要把它们重新发表。第三个阶段是我决心转向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从1973年到现在，也差不多40年了。这个阶段所发表的文章（除专著外）分别集成几个文集：

1. 《应用语言学与中国英语教学》（198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收集了70—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共20篇。

2. 《应用语言学研究》（200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收集了80—9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共23篇。该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文集之一，但没有对外销售。

3. 《桂诗春自选集》（2007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收集了90年代以后的24篇文章。

4. 《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2007年1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收集了90年代以后的40篇文章。

3与4均在2007年出版，两者都包括90年代至2005年所写的文章，自然有

不少是重复的。但是3是作为广东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之一而出版，要求选入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篇幅上的限制。4是作为“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之一，要求集中在英语教育。两者有不同的序言。

这次所结集的文章都是在2005年至2012年间所写的，和前面4个集子的文章都没有重复（其中有个别文章是2005前写就但没有收进以前的集子里的）。文章基本上按发表时间倒排，只有《大潮拍岸浪花飞》一文原发表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庄智象主编），放在第一篇，因为它有点自传体性质，作为代序。其余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式”，大都是根据当时的学术兴趣或读书偶得而写成，有的则根据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或发言整理而成。一类是“命题式”，大都是应邀而写作的，这包括一些个人的回忆、感想和访问录。这些东西大都没有保留底稿，收录在这里的仅是已经发表过的。《语言测试的回顾——访谈录》是何莲珍和亓鲁霞两位教授访谈和记录整理的，发表在2010年*Language Assessment*第7期，关于语言测试的观点是我的，但题目则是访谈者或编辑者所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只好原文照录。

我所写的东西希望能遵守两条原则：一是言之有物。我觉得这是“自由式”写作不可少的。年轻的时候（大概刚上高中），爱看宋词，也会摇头摆脑地哼它几句，老师让我们学生“自由式”写作，我居然写了一篇《说愁》，因为宋词里有不少都和“愁”有关（可能是反映了当时宋朝人的社会心态），文章里把我认为有“愁”字的佳句罗列满篇，但却无甚中心思想。老师看了我的作文后，批了几个字“满肚子牢骚不合时宜”。我看了评语，哑然失笑。因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哪里懂得多少人间辛酸事？我这不是“为赋新词妄说愁”吗？从此我懂得写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切忌无病呻吟。二是文字通顺易懂，尽量写自己已弄懂的东西。老实说，我自己就很讨厌看那些学究式的文章，有一些研究生常让我帮忙看他们的开题报告，报告往往东抄西录，看了半天还没有谈到点子上。我通常的回答是，我不看了，你索性用几句话（最好是中文）告诉我你要研究什么？有什么意义？我专门抠“几句话”，因为他们不至于从盘古开天说起。我年轻时写杂文，把鲁迅作为我的偶像。我对杂文风格的领会是，匕首、投枪，刀刀见血。用这两条原则来审视我的东西，正好应英语的一句话：Leave much to be desired（还有很多待改进的余地），愿与诸君共勉！

集子定名为《桂诗春英语教育未了集》，“未了”取义自庄子的《养生主》的开始和结尾的两段文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和“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穷的学问，永远是“未了”的，也许生命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追求、在于薪尽火传。另外它也表明集子是《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的延续，愿假有生之年，

奋斗不止，使学术之树常青。

最后，我想对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艾斌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已年迈力衰，居然还能整理出这个集子来，全靠她的细心安排和策划。

桂诗春

白云山水之间

2012年7月

目 录

大潮拍岸浪花飞 / 1

语言和交际的几种新观 / 14

面向交际的外语教学 / 27

此风不可长——评幼儿英语教学 / 39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 50

——贺胡壮麟教授八十华诞

此情可待成追忆 / 52

——记当年的美英问题研究室

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前景与资源共享 / 57

治学就是自学——回顾和思考 / 59

语言测试的黄金法则 / 74

应用语言学家的责任和良心 / 77

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大环境的一些思考 / 80

——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14次学术年
会上的发言

语言测试的回顾——访谈录 / 88

应用语言学：历史、发展和新视野 / 107

风雨兼程三十载 / 123

一个大题目 / 125

三点希望 / 127

在外语学刊会议上的发言 / 129

不确定性判断和英语学生的虚化动词习得 / 131

我国英语教学改革要与时俱进 / 159

语用域意识与二语习得 / 163

有感于我国语文教学 / 176

英语词汇学习面面观 / 179

——答客问

世纪回眸 风采依旧 / 194

——评《言语的萌发》

附录 桂诗春著作一览表 / 199

大潮拍岸浪花飞

我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大学生，从1950年开始就在大学读书、毕业、留校工作至今，超过了半个世纪。如果把我的经历一分而二，回首往事，鉴往知来，倍觉开放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果弥足珍贵。我国的外语教育在这个开放改革大潮中经历过许多翻腾的岁月，我只想谈一点和我个人关系比较密切的事情——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的建立。这个学科从小到大，体现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它发展神速，远超出我的个人的视野。所以这篇文章仅是谈到它是怎样从一株小枝发展起来的，至于它成林后的种种“敷蕊葳蕤，落英飘飘”的盛况，则非本文所能覆盖。

缘分的天空

我在1988年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应用语言学和我》，其中有一个小标题“道是无缘还有缘”，说明我是怎样走上应用语言学的道路的。我想在这里稍作改动，说明应用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和茁壮成长，完全是历史的机缘。这也就是说，处在多方位的全球性环境中，中国要大力发展外语教育，而促进外语教育科学的发展乃是大势所趋。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开始介入外语教育。在“文革”前的10年里，也教过多门课，包括英语精读课、泛读课、写作课、英国文学史、外国文学、英美文学选读、文艺理论等课程。当时的综合性大学里的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培养目标是外语工作者，所采取的培养途径是所谓“文学道路”，以阅读和欣赏文学原著为最终目标。我从教基础英语课转到教一些文学课，走的应该说是一条“正途”。虽然我对语言，特别是语法，也很感兴趣，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应用语言学。就我的观察，我周围的老师和同事也很少谈论外语教学的理论，反正是我们自己是怎样学英语的，我们就教学生依样画葫芦地去学英语。有一位教授的英语课讲得很成功，很受学生的欢迎。后来她也尝试开一门英语教学法的选修课，能够在国内找得到的教科书无非是Sweet（1899/1964）、Jespersen（1904）和Palmer（1917/1968）那几本。在师范性大学里的外国语言文学系里所开设的课程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多了一门外语教学法的课程，但是只是一个学期的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里占的比例极低。所以就整体而言，我国50—60年代的外语教学可说是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随意性很大。教学的好坏全凭老师个人的经验。至于教学大纲和教

学计划（课程设置），那都是上面规定好的，一般的老师并不怎么关心。按道理，外语教学从教学方法、教材到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应该是一门科学，有其内在规律。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再加上那时的学校连年搞政治运动，学生也要学工学农，教学秩序很不稳定，而学生的起点又比较低，有时要从ABCD教起，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进外语教学，1964年国务院下属的5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还专门到外语学院作报告，以飞行员为例，鼓励学生又红又专，既要能够上天，又要有正确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带头掀起“听说领先”外语教学改革，一时大江南北，桴鼓相应。我们在中山大学也试图引进“听说领先”的方法，有一位老师在本科一年级采用Palmer（1925/1959）的*English Through Actions*，我在二年级的精读课里，则试图把课文内容画成挂图，让学生“看图说话”。这两项试验都取得一些好的成果，学生的说话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教了一个学期，问题就来了。Palmer的书只能供一个学期使用，而我的二年级课本有一些内容比较抽象，不容易用图画来表现，而且有很多语言点是需要理解才能掌握，不是流利上口就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文革”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场外语改革运动也就中途夭折了。回过头来看，问题出在改革缺乏坚实的理论指导和结合中国实际的通盘考虑和设计，外国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往往都是短期的、集中的训练，而我们却是为期四年的本科教育。

“文革”对外语教育的摧残，罄竹难书，无须在此细说。但是在“文革”后期却发生了一件影响了我的后半生的大事。大概在1973年间，作为中英邦交升级的一个成果，我国派出了一个英语教师代表团访英，由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一所和上海两所中学各派一位代表组成。我们这几个人尽管年龄不同，有各自的经历，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在几年“文革”里业务都荒废了，谁也没有摸过英语。为了做一点准备，在访英前我们请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教授和许国璋教授分别从英国文学和英国语言学两个方面给我们作概况报告，另外还全团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前辈。吕先生在他的住所接见了我们，给我们谈了一些访英值得考察的东西。当时英国的Randolph Quirk正在开展英语用法调查，吕先生让我们了解他的调查有没有使用到计算机。吕先生还专门提到Halliday等三人（1964）的那本书《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值得一读，对我们访英会有不少帮助。这本书1964年出版后即被我国及时引进，但在“文革”中却被束之高阁，不为人所注意。我曾浏览过这本书，但也没有认真深究其意义和作用。

应用语言学的兴起

为了说明我们访英的背景，似应在这里倒叙应用语言学的兴起。谁先提出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学科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的格局，外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作用大大加强。在二战中美国从1942年底开始实行《军队特殊培养计划》，专门培养派往各地部队的外语人才，请了Boas、Sapir、Bloomfield、Lado等语言学权威参与外语课程的设计。这些语言学家不是纯粹从个人经验出发，而是把研究语言教学活动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其间，Bloomfield应邀写了一本手册《外国语实际学习导引》（*An 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1942），Bloch和Trager写了《语言分析大纲》（*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1942）。该课程开办了9个月，培训了15 000人。战后，美国密执安大学创建了英语学院，在曾参与军人培训的语言学家C. Fries以及R. Lado等人的领导下，研究教外国人英语的问题，并创办了著名的《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杂志，其副题当初就叫《应用语言学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冠以应用语言学的杂志。1958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生部在英国文化协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应用语言学学院，1959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美国华盛顿建立了应用语言学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64年是应用语言学走向成熟的一年，在法国南希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成立了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简称AILA），Halliday等三人出版了《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The Language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被认为是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教科书，而在美国则出版了W. River的《心理学家与外语教师》，遥相呼应。前者继承英国Jones语音学派和Firth社会学派的传统，而后者则继承美国心理学派的传统，但都着眼于“纯”语言理论和它的“应用”的问题，认为语言理论的最重要的应用是在母语和外语教学领域。

反观我国，1964年正是逐步走向“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年代。在我们“闭关锁国”的时候，应用语言学正在海外高歌猛进。AILA每隔3年召开一次大会，而且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应用语言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简称IRAL）。1966年英国建立了语言教学信息中心，英国应用语言学协会于翌年召开第一次年会。英国著名的Nuffield基金会资助了几个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规划，包括儿童学外语、移民学英语和英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英美的许多大学都在陆

续开设应用语言学专业，名称也不完全一样，多数称为“应用语言学”，也有称为“TESOL”（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TESL”（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或“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甚至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的。Pit Corder（1973）的《应用语言学引论》（*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Allen和Corder主编（1973—1977）的4卷集《爱丁堡应用语言学教程》（*The Edinburgh Course in Applied Linguistics*）陆续问世，提供了研修应用语言学的教材。1977年美国TESOL大会专门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邀请了一些著名应用语言学学者来研究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Kaplan（1980）后来把会议发言和有关的论述汇总成册，与会学者对应用语言学的定义做了有益的探讨。

如此种种，已是明日黄花，如果我们事先微有所闻，我们的考察就会有所深入。但是我们这几个与世隔绝了10年的英语教师对这些发展却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的访英之旅仅是一次应用语言学的启蒙之行。

访英之旅

我们大概是在1973年复活节前访英共3周（其中两周是由英方按计划安排，一周是按我们的要求延长的）。英方接待单位是英国文化协会，对我们访问作了精心的考虑，目的是让我们亲身体验10多年来在英国兴起的应用语言学。全程陪同我们的是一位拿了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的女士。我们被安排到Essex的Colchester英语学习中心，住到老百姓家里，白天上午听课或听讲座，下午到英国南部的大学、中学、语言学校参观。接待规格相当高，当时英国外交部次长出面请我们在伦敦的河畔剧场吃饭，浏览泰晤士河的夜景，饭后还去看萧伯纳的《苹果车》。我们所到之处，地方报纸都有记者来采访，并做出专门的报道。

我们受益最大的那些应用语言学名家的讲座，Pit Corder（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学院的主任）、P. Strevens（Essex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主任）、A. Spicer（Nuffield 基金会的中小学外语改革项目主任）、L. Alexander（著名的英语教材编辑专家，我国流行甚广的《新概念英语》教材的编者）、学习中心的主任等都来给我们介绍情况。英国文化协会还专门组织了一场座谈会，请了英国一些著名的语言学校的校长和我们交流英语教学的情况。讲座以外，学习中心的教师也来给我们讲课，因为对我们的情况不大了解，所以开的课不大适合我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给我们讲英语语音学和语法学的基本常识，我们告诉他们这些内容在中国的大学、中学都已学过。后来我们多参观一些语言学校，才认识到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有三大类：一类是外国学生，学英语是为了进一步到大学里学习各种专业。二类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特定目标英

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学生, 针对学生的特定需要来安排课程, 例如英语学习中心当时就有一批来自非洲的学生专门来学习生物入工授精英语的, 学完几周就走。三类是一些准备到海外教英语的英国人, 他们对自己的母语缺乏足够的语言学理论知识。英语学习中心基本上是把我们将作这类学生来处理。

在英语学习中心里, 我们还有机会到语言实验室里上机以体现当时相当流行的所谓“四步训练法”, 四步指输入、输出、正确答案、巩固 (重复正确答案)。语言实验室兴起于60年代中叶, 一度被看成是解决外语教学的“最终方案”。经过一番狂热后, 人们才清醒过来, 认识到这种缺乏“人性化”的做法并不可取。我们到英国后, 刚好就是这个阶段, 但语言实验室是一笔重大投资, 建立后即废置, 也是个浪费。讲求实际的英人认为, 语言实验室适宜于“个别化学习” (individualized learning)。让学生按照个人的需要, 自行安排时间到语言实验室选择合适的课件, 进行练习, 而不把它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来要求。

我们也参观了一些英国的大学、中学,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所普通中学 (英国人称为comprehensive school, 以别于传统的grammar school) 的英语课, 学生是高中毕业班。参观前, 我们想当然, 这当然是一门英国文学欣赏课。因为在我国, 高中的汉语课就是教些文学作品。但是到课堂里坐下才知道这竟然是一门英语语言课, 教师向学生放了几段英语录音, 都是一些现场的谈话, 我记得有丘吉尔的战时炉边谈话, 有教堂的牧师布道, 有伦敦商店柜台女售货员的闲谈, 有家庭妇女的交谈。录音放完后, 教师向学生提了三个问题: 说话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他们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 他们的收入有多少? 要求他们根据这几个问题来决定每段录音的说话人的个人和社会历史。结果学生经过热烈的讨论都达成共识, 在讨论中他们主要是根据每段话的口音和内容。听课课后, 我大感兴趣, 向授课教师了解这门课的教学大纲, 他拿出一本活页的红皮书, 题为《使用中的语言》 (*Language in Use*) (Doughty et al. 1971)¹, 原来这是Nuffield基金会资助的一项应用语言学研究项目, 叫作“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规划”, 由伦敦大学的普通语言学系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主持人就是上面提到的《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的作者Halliday, 他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访英几周, 仅是走马观花, 但我们却感触良多。我们这批人毕业后虽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英语教学, 但都是照搬我们所接受的旧的教学模式, 从没有想到改弦易辙, 更没有想到英语教学还有那么一片广阔的天地。它之所以广阔,

¹ 这本“小红皮书”早已断版, 我从英国带回的那一本也丢失了。后来见到Halliday提起此事, 他告诉我, 美国的一所大学取得他的同意后, 把整本书放在网上, 我即去下载。但是它只在网上放了一段时间, 网页很快便关掉了。对它感兴趣者, 可与作者 (itscgui@yahoo.com.cn) 联系。后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同名的教材, 和这个教学大纲没有什么关系。

不仅是牵涉到很多领域，而且在于它丰富的科学内涵。而我国又是一个英语学习人口众多的大国，科学决策尤显得重要。我们在参观过程中不期然地谈到“转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引进应用语言学这门科学。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可用“沉舟侧畔千帆过”这句话来形容。我无意用“沉舟”来表示我们过去所走过的“文学道路”，因为在应用语言学里，文学教学、文学语言教学、文体教学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沉舟”无非是指我们过去关于外语教学的一套旧理念，我们必须用“千帆”扬起的应用语言学来重新审议。

一个专业的建立

从英回国后，我们带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了一个报告。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教委处在军管，这个报告石沉大海，并无反应。英方当时还送了一些书籍给我们，全部被没收上缴。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领导关心的无非是完成一个交流项目，而不是这个项目的内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谈论什么建立专业，那不是“以生产压革命”？

没有多久，我国又卷入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都噤若寒蝉。但是就我而言，却是暗地里开始一个自我学习应用语言学的计划。我首先攻读的就是那套4卷集的《爱丁堡应用语言学教程》，其中第4卷《测试和实验方法》是需要花工夫的，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太薄弱了。

“四人帮”垮台后，思想得到解放，我们才能放开手脚去开辟我国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

1978年是我国“拨乱反正”的重要的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使人振聋发聩。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1977年10月决定我国高校恢复招生，1978年开始纳入正轨。同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来自全国62个高等学校外语院系和高校公共外语教研室、11所外国语学校、10所中小学的代表，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共235人。我得以躬逢盛会，听到了周扬、廖承志、许国璋等人的报告和讲话。会议提出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于1979年3月印发全国有关学校。《意见》的第7条为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配合座谈会的召开，《光明日报》11月9日的《教育科学》版11期，登了3篇文章，季羨林老先生的《外语教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从宏观上提出外语教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管见的《希望放映一些原文版的电影》从微观上提出加强外语学习者和外语的联系的建议。桂诗春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指出，“应用语言学把普通

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来指导外语教学，正在发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引进应用语言学，组织广大教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吸收这个学科的精华，以逐步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符合我国实际的应用语言学体系。有一个思想需要廓清：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只要提高语言水平就足够了，不必讲究什么教学方法。其实，语言教学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东西；怎样把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是一种复杂的学问。”

1978年我们（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刊物《现代外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国是1981年才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我们招收应用语言学研究生时，还不知道能否授予这样的学位。在申报学位时，我们只是按习惯申报一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后来审批下来，我们居然除了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外，还多了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后来才知道，这是教育部高教一司外语处蒋妙瑞、任丽春的建议。把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连在一起，在英、美、澳、加等国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做法，如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986年，我们又进一步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成为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顺利通过教育部的审核，是迄今我国外语界在此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我们在创办这个专业时主要是抓了下面几件工作。

（1）培养骨干。首先是举办了各种应用语言学培训班，从几周到一年，学员是在职的高校教师，教员则是来自英、美、加、澳等地的教授（如Ted Rodgers、Gloria Sampson、David Ingram、Nina Spada、Roger Gannon、David Cooke、Ian Martin等等）。这些培训班就是播种机，很多学员回到原单位去，就开始耕云布雨，扯起应用语言学的风帆。与此同时，我们又派出自己的老师往国外和香港进修或攻读应用语言学的硕、博士学位。对年纪稍大的教师，我们主要是提出具体开设一门应用语言学课程的要求。从1986年开始，我们又开办了“应用语言学暑期讲习班”，每期学员100余人。为了扩大影响，我们还把讲习班办到一些西北和西南的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能够开出应用语言学的大部分的核课程。

（2）开展学术交流。1980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在广州举办“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11个省市22所高等学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的代表共45人。198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发起的“应用语言学研讨会——汉语社区的语文教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我国香港各大学和教育

机构的学者, 澳门东亚大学的学者以及内地各大学的学者, 共63人, 来自内地的有17人。1985年,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由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简称ISTEC), 会议规模很大, 内地正式代表及特邀代表共48人, 列席代表40余人, 来自52所综合性大学。来自国外的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教学法专家、测试专家有20多名, 例如来自北美的有R. Tucker (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J. Alatis (美国Georgetown大学, TESOL主席)、R. Bailey (美国Michigan大学)、W. Bright (美国California大学、美国著名的*Language*的主编)、C. Paulston (美国Pittsburgh大学)、B. Robinett (美国Minnesota大学)、T. Rodgers (美国Hawaii大学)、M. Swain (加拿大Ontario教育研究院); 来自英国的有H. Widdowson (英国London大学)、A. Davies (英国Edinburgh大学)、P. Strevens (英国Bell教育基金会总理事、剑桥Wolfson学院)、A. Maley (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印度代表)、U. Jaspar (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 来自澳大利亚的有M.A.K. Halliday (澳大利亚Sydney大学)、J. Platt (澳大利亚Monash大学)。还有来自我国港澳地区的Van Naerssen (香港中文大学)、张日升 (香港中文大学)、Gail Fu (香港中文大学)、邹嘉彦 (香港理工学院)、余晃英 (香港理工学院)、M. Macmillan (澳门东亚大学)。长期在华工作的专家David Crook和Isabel Crook也参加了会议。国内的专家教授, 如陈嘉、王佐良、许国璋、丁往道、胡文仲、胡壮麟、陆慈、李观仪、陆国强、孙骊、杨惠中、李筱菊、何自然、桂诗春、杨秀珍、莫大树等也都参加了。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王佐良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说, “据我所知, 这次国际讨论会是在中国大地上首次召开的关于英语教学的国际会议。因此,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 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有: (1) 汉语社区的英语教学; (2) 大纲设计和教材编写; (3) 专业英语和学术英语; (4) 阅读和写作的教学方法; (5) 语言习得、英语教学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6) 语言测试。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60多篇, 国内教师提出了48篇。大会最后由Halliday代表所有海外参加者致辞, 他先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然后再用英语发言。1992年在天津召开了中国英语教学研讨会 (ELT in China), 可以说是这个会的延续。参加会议的有200多人, 绝大部分是中国英语教师, 而且按照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许国璋会长的意见, 让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会上台宣讲自己的论文, 结果是除了主会场外, 还有6个分会场。这是我国英语教育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3) 积极引进学科的专业书籍和杂志。要培养人才, 不能没有图书, 广州外国语学院优先购进和订阅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书籍, 其藏书的丰富是国内知名的。有一次, 英国文化委员会派英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专家Brumfit

来学院考察，以了解学院是否具备执行中英合作项目的条件。他跑到我们的资料室，吃惊地发现里面居然藏有一本希腊先贤的语言学著作，说：“这本书我在英国找了很多个图书馆才找到”。我们还认为，结合中国实际编写一些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教科书，是普及学科的好办法，因为不见得很多学生都有机会看到原著。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写和出版了“语言学系列教材”，共有10本，包括《普通语言学基础》（王刚）、《语义学导论》（伍谦光）、《语用学概述》（何自然）、《语篇分析概要》（黄国文）、《应用语言学》（桂诗春）、《文体学概论》（秦秀白）、《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应用心理语言学》（王初明）、《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桂诗春）、《社会语言学概论》（祝畹瑾），其中大部分是我院教师编写的。许国璋教授亲自为这套教材两次作序。在第一次所作的序言里，他说：“任何学术机关，能一下子写出属于同一学科的6本理论著作，都是不小的成就。当所攻的学科在国内还在基础待立的阶段，作者的创业精神当然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1988年有6部讲语言学的书同时出现在我们中间。它们的出现和存在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一种力量，推动我们文科的科学教育。我们衷心期待着。”在第二次所作的序言里，他又说，“我曾经读了系列中大部分书，其审细明察，叫人折服，这里点燃了一个文化火堆，它的光亮为我们共有共享，一旁是辛苦的添薪者，却像过去一样不求闻达。”他专门谈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桂诗春、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惠中和北京大学的祝畹瑾。其实他介绍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系列中引进了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新兴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实践性、技术性很强，学文科的人往往视如畏途。与此同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在筹划出版另外一套视野更广的“现代语言学丛书”，我记得是在1981年杭州召开的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期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和我接触，让我主编这一套丛书。我觉得自己的水平有限，建议找许国璋和王宗炎两位语言学界老前辈出任主编。出版社的同志说，请他们担纲，当然很好。但他们和两位老先生不熟，我说让我试试看，首先和许老接触，他即爽朗地同意。由此开始北许南王的合作，从主编“丛书”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合编“语言学、世界诸语言”这一分支学科的条目，两位前辈对主编“丛书”都十分认真，从选题到看稿都亲力亲为。

(4) 参加应用语言学的实践活动。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实践，实践的核心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组织或参与的项目包括编写“交际英语教材”（CECL, Communicative English for Chinese Learners）（李筱菊）、英语水平考试和高考英语改革（桂诗春、李筱菊、李葳）、中国学生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桂诗春、王初明等）、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何自然、阎庄）、中国学生英语语料库（桂诗春、杨惠中）和英语写长法研究（王初明、郑超等）。